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甬籍翻译家的文本实践^{*}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林晶晶 毛皓楠

摘要 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近代甬籍翻译家群体在港口空间、同乡网络等多元场域的文本实践,揭示地域空间特性与文化、知识转译的互构机制。研究发现:(1)宁波作为近代通商口岸所具有的地理开放性与同乡网络的社会联结性,共同构筑了翻译生态系统,并形塑了甬籍译者的翻译惯习;(2)甬籍翻译家群体依托地缘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双重纽带,构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协同生产机制;(3)“在地化转译”作为空间实践的核心机制,实现了外来思想资源的本土化转化,推动现代知识体系与本土社会需求的深度耦合。研究结果印证了以甬籍译者为代表的浙江翻译群体在中国翻译史中的重要地位。甬籍译者的实践经验彰显了浙江作为地方翻译重镇的价值,推动了区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为中国翻译史的发展与本土话语知识转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 甬籍翻译家 空间生产理论 在地化转译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25)04-0074-0007

DOI 10.20139/j.issn.1001-5795.20250411

1 引言

地方翻译群体在中国翻译史图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古至近现代,浙江翻译家通过多元实践路径,成为浙东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担当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的推动者,展现了地域文化精神对翻译活动的深层塑造。作为浙江翻译家中的卓越群体,甬籍翻译家以翻译为媒介,将浙江的地域智慧转化为跨文化对话资源,同时吸纳世界先进思想反哺本土,构建了贯通中西的文化交流网络。他们在进步思想传播、外国文学译介、政治著作外译以及地方文化推广等领域成就斐然,彰显了地方译者在翻译史上的先行者使命。宁波自宋元以降便形成“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独特文化地理格局。该群体承袭了黄宗羲“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又深度参与了近代先进思想传播和知识生产。开埠初期,穆炳元以宁波话注音洋泾浜英语,是近代中国“在地化转译”的早期实践,建构了连接本土知识体系与外来现代性知识的跨文化通道。吴亮平、董乐山、草婴等甬籍翻译家的译介实践在翻译史上意义独特,使甬籍译者成为观察浙江翻译文本生产的典

型样本。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家研究历经从“文本本位”到“译者主体”的范式转型。学界将译者置于社会文化网络中考察,研究领域呈现出空间转向与红色转向的双重学术图景。在空间转向维度,周领顺等(2014)引入地理空间分析的新视角,聚焦吴文化审美取向对苏籍译者修辞策略的形塑作用。牛荣亮、许明(2023)系统探究了珠海籍译者的群体特征,揭示了地域历史文化对译者发展的深层影响。梁林歆、李浩然(2023)从翻译的“内部史”和“外部史”视角考察了鄂籍翻译家的译事活动与地缘身份建构,展现了地域文化与翻译实践互动的复杂图景。仲文明、王婧涵(2023)着眼于中国科技翻译家群体,通过制度资本与翻译选材的共变关系分析,拓展了地理空间要素在专业领域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场景。在红色转向维度,聚焦翻译与革命话语建构的内在关联。方华文(2005)揭示了翻译活动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生产工具的本质属性。岳峰、朱汉雄(2021)构建了红色翻译史研究方法论,强调以原始档案为基础,运用翻译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路径进行系统考察。既有成果为翻译家

研究开拓了新维度的阐释空间,但存在史料碎片化、对象同质化问题,亟需构建全域性史料谱系并拓展多元翻译家类型,挖掘区域译者职业网络的空间延展性及其精神谱系的历史生成性。王建开(2007)指出,文学翻译场域长期占据研究主流,科技译介、制度移植等非文学翻译谱系的学术关注度严重不足,导致翻译史研究图景存在结构性缺失,难以全面呈现不同领域翻译家的职业特质与精神风貌。探究翻译家的内在驱动力,需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聚焦其道德精神维度(方梦之,2021)。同时,现有研究范式多采用“地域特征—译者实践”的单向解释和静态空间分析框架,翻译实践对文化空间的反构作用,以及译者跨区域流动中文本生成机制的动态演化过程有待考察。

综上,本文拟突破静态地域分析的窠臼,运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系统剖析甬籍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群体网络及文本生产的动态机制。本研究聚焦三大核心维度:第一,港口空间的地理基因如何通过“空间实践”形塑译者的翻译惯习?第二,同乡网络作为“空间表征”的社会载体,如何重构知识生产的空间权力逻辑?第三,甬籍翻译家的“在地化转译”如何介入现代中国知识体系的空间建构?

2 空间生产理论与甬籍翻译家

2.1 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开创的空间生产理论,颠覆了传统空间认知范式。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每一个受到分析的社会空间的瞬间,不是只掩盖了一种社会关系,而是掩盖了许多社会关系,这些都可能从分析中揭露出来”(列斐伏尔,2022)。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表征性空间共同构成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模式,这三元本体是互构关系,它们通过“实践—规训—抵抗”的辩证运动实现空间的动态再生产(Lefebvre,1991)。空间实践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物质基底,通过日常活动建构社会空间的连续性。它始终受制于空间的表征——权力主体通过政策、符号和制度建构的抽象秩序。这种秩序反向规训实践,又被表征性空间所解构(张一兵,2025)。空间生产理论为理解译者实践与地域文化的动态互构提供了新视角,译者的文本生产深嵌于空间三元辩证的场域。译者既是空间实践的物质性重构者,更是表征性空间的符号性生产者。其中,在地化转译是空间实践的核心机制之一,通过语言的地方性重写,将源文本转化为

契合目标语地域文化认知与实践需求的文本形态。

2.2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甬籍翻译家遴选

本研究界定的甬籍翻译家,特指出生于宁波、在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投身翻译实践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完整经历了中国翻译现代化进程。本研究参照《中国翻译家辞典》《浙江翻译家研究》等文献,根据地缘属性、时间坐标、实践向度、历史效度四维筛选框架,最终确定1901—1949年间活跃的12位甬籍翻译家作为研究样本。具体筛选标准如下:(1)地域原生性。研究对象具有宁波地域成长轨迹。(2)时间限定性。1901—1949年既是中外思想交汇的关键阶段,也是甬籍译者跨地域实践的高峰期。(3)实践相关性。其翻译活动深度参与经典文本译介、新文学传播或进步思潮引介,呈现出明确的社会现实指向。(4)历史显著性。存留可验证的文本传播轨迹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研究对象中,10人曾赴上海或海外求学,12人具有跨区域翻译经历,见表1。

3 空间生产理论视域下甬籍翻译家的文本实践

3.1 港口空间的地理基因与翻译惯习的空间实践建构

3.1.1 通商口岸的物质性支撑:空间实践的资源基础

空间实践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物质基底”(张一兵,2025)。宁波作为首批通商口岸的地理特性,为文本生产提供了天然的资源基础。开放性的地理空间不仅为甬籍翻译家早期接触外来知识文本创造了环境,更通过贸易往来、传教活动与技术引进等空间实践所积累的印刷工业基础、买办群体等跨语言人才储备,以及商业资本对知识传播的需求,共同塑造了甬籍翻译家跨文化传播的能力谱系,成为近代知识转译的核心力量。

首先,港口地理形塑了跨国知识流动的空间网络。宁波依托开埠政策构建的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场域,成为19世纪至20世纪中西知识交汇的重要枢纽。通过沪甬双城联动的区域枢纽机制,外来知识经由港口物流通道、传教士传播网络及商人迁徙路径,形成由上海输入,经宁波中转,再辐射到浙东的传播体系。王任叔、楼适夷、叶水夫等译者在沪接触早期先进思想和外来文化,完成从地域文化认同到现代思想体系的认知升级。其次,临港文化载体为甬籍译者的成长

表1 近现代甬籍翻译家(以姓氏拼音排序)

序号	翻译家	出生地	求学经历	跨区域翻译经历
1	草婴	宁波慈溪	曾就读于上海雷士德工学院附中、松江二中和南通农学院	1952年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翻译俄国和苏联文艺作品
2	崔晓立	宁波鄞州	曾就读于宁波师范讲习所,1926年春赴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成立“上海中山主义研究会”,翻译大量著作;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杭州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翻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相关著作
3	董乐山	宁波海曙	幼年先后就读于私塾、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后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194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1956年,新华社成立翻译部,董乐山担任业务秘书;1961年返回上海,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1976年,重译《西行漫记》
4	李俍民	宁波镇海	1942年赴苏皖边区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后于1946年考入沪江大学外文系	先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任编译员,期间翻译了《牛虻》等著作
5	楼适夷	宁波余姚	1928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后赴日留学,专修俄罗斯文学	1933—1937年被捕入狱,翻译高尔基的《在人间》等作品;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京后,翻译《朝颜》等作品
6	柔石	宁波宁海	1911年,就读于宁海县正学小学;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1918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后曾赴北京大学	1928年在上海结识鲁迅先生,后出版大量译著
7	王任叔	宁波奉化	1915年考入浙江省第四师范,1928年赴日学习	1928年在日本研究社会科学与普罗文学,翻译《苏俄女教师日记》及日本长篇小说《铁》;1941年9月,赴新加坡,期间翻译《和平与面包》等著作
8	王鲁彦	宁波镇海	1920年参加工读互助团,后从上海至北京大学旁听	1923—1928年在湖南任教期间,翻译《犹太小说集》等作品;1928年春,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
9	吴亮平	宁波奉化	1919年,进入南洋中学学习;1925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学习期间,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合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930年2月,在中共法南区委工作,翻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6年斯诺到陕北访问,担任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翻译
10	叶水夫	宁波宁海	自幼到上海求学,1939年于麦伦中学毕业,进入沪江大学学习	1943年进入上海时代出版社,翻译《高尔基早期作品集》《赴苏使命》等作品;1951年任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期间翻译《青年近卫军》等作品;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翻译《苏联文学史》等
11	殷夫	宁波象山	1920年秋,考入象山县高等小学;1925年,进入上海民立中学;1926年,转入浦东中学,后进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	1930年加入左联,翻译《自由与爱情》
12	朱镜我	宁波鄞州	1920年7月,浙江公费留日学生;1924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	1927年10月回到上海,主编《文化批判》月刊,翻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农业问题理论基础》等著作

提供了实体支撑。以“国民喉舌,民众先导”为宗旨的宁波《时事公报》,初期聚焦反帝、抵制日货、爱国主义等议题,在传播进步思想、推动社会改革及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跨文化知识生产提供了舆论平台与思想资源。该报“日本的研究”专栏通过系统性译介海外时政与学术成果,成为浙东地区抗日救

亡与民族力量凝聚的重要思想阵地(周军,2007)。再者,双语教育体系奠定了译者的跨文化能力基础。宁波的甬江女子中学与效实中学实施了差异化的语言教育模式。前者依托教会资源引入西方文学经典与现代学科教材;后者作为本土新式学堂,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下开设英、日、法多语种课程。中

西合璧的教育空间,不仅培养出兼具古典文学功底与外语能力的译者,更通过校园读书会、进步社团等非正式空间,形成俄苏文学传播的微环境。李俍民在效实中学就读期间,通过阅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译介作品,形塑了对革命叙事文本的价值认同,其后来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重译,正是教育空间所孕育的跨文化认知在翻译选题上的显化呈现。

3.1.2 港口文化的符号编码:文本风格的惯习生成

翻译实践本质是译者在特定社会空间中通过语言策略建构意义的文化行为。宁波港口文化特质——“内敛中的涌动、博纳中的进取、闯荡中的理性、开拓中的坚韧”(叶苗,2010),构成塑造译者惯习的生成场域。港口文化基因使甬籍翻译家在语言选择、文本处理与意义建构时展示出稳定的实践倾向,具体表现为语言在地化、叙事完整性、翻译精确性三重互文共生的翻译惯习。

一是港口文化“内敛中的涌动”特质,在甬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中外化为“本土话语体系与外来革命思想”的创造性融合。宁波长期作为中外交流枢纽,其港口文化孕育的“语言杂糅—通俗表达”传统,既有西方商贸语言、传教士译经的外来语言因子,又深植吴方言体系的本土语言基因,二者在互动中形成贴近本土认知的独特话语生态。这种文化基因促使译者采用既非完全直译的“欧化腔”,亦非彻底归化的“本土改写”,而是在语言杂糅中实现在地化转译。草婴翻译列夫·托尔斯泰作品时,将这种“杂糅智慧”升华为艺术化实践。他融入宁波方言句式短、节奏快和口语化表达的特点,同时保留俄语长句的思辨性结构,形成“洋为中用、文白相济”的独特文风。冯骥才(2011)评价其译作让读者产生“那些异国大师用中文写的”错觉,在跨文化转译中消弭语言壁垒,使外来思想以“本土原生”的形态自然呈现,实现“内敛”的文化根性与“涌动”的革新意识的完美统一。董乐山对《西行漫记》原文中的信息进行适应性转换,如采用四字成语,将计量单位和名词归化为中文读者熟悉的形式,以达到最佳的交际目的。二是“博纳中的进取”的港口文化品格,在翻译场域体现为对文本“叙事完整性”的执着追求。甬籍翻译家拒绝将翻译简化为“文化过滤”,而是以“博纳而不盲从”的主体意识,守护异质文化的原真性特质。叶水夫“自然朴素、力求准确”的译文风格(张杰,2000),草婴为《托尔斯泰全集》保留200余

幅俄版插图的坚持(陈洁,2020),本质上是对“译作风格不可掩盖原作风格”这一翻译伦理的践行。李俍民反对《牛虻》译本删节宗教内容的案例(朱安博,2009;徐艳红,2011),折射出译者对文本内在逻辑的尊重。当傅东华以“东吴软句”改良译本,且编辑部删减该作近30%时,李俍民批评指出,删除基督教隐喻不仅削弱了情节张力,更消解了原作对革命与信仰冲突的深刻探讨。这种对“叙事完整性”的坚守,既源于港口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也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文本生产中“以我为主”的进取精神,即通过完整译介异质文本,为本土话语建构提供多元思想资源。三是浙东实学传统与商业理性的双重浸润,形塑了译介实践中的精确性价值取向。宁波商帮在跨地域商贸活动中积淀的“闯荡中的理性”精神,转化为对知识转译精确性的执着追求,甬籍译者建构起“文献校勘—多语互证—历时调整”的三重验证机制。这种惯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核账式”文献校勘严谨锚定史实精确性。董乐山翻译《红星照耀中国》时展现的考据精神,堪称商帮“分毫必较”文化基因的投射。他以对待商业账册的审慎态度,逐一审校胡愈之早期译本中的史实偏差,将误译的政论典籍《醒世良言》订正为《盛世危言》,修正“革新派作者”为更贴合历史语境的“改良主义学者”,甚至精确到地理距离“140里”至“120里”的数字校准(罗倩妮,2015)。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极致苛求,超越了普通译学层面的“信”之标准,而是将商帮文化中“契约即信用”的核心准则,转化为文本生产中“史实即权威”的翻译伦理,确保外来文本在跨语际迁移中不被误读。其次,以“验货流程”式的多语互证构建语义校准体系,即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的版本,确保语义的准确传递。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时创设的多语种对照机制,暗合商帮在贸易中“多方验货、杜绝差池”的实践智慧。他以德语原典为基准,同时参照日、俄译本进行语义三角验证,构建了“源语概念—中介语种阐释—目标语表达”的审校模式。这种操作模式既避免了单一译本潜在的理解偏差,又通过俄语版本贴近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革命语境”,最终在汉语译文中实现学理精确性与政治适配性的统一。最后,以历时调适应对语境变迁需求。针对1930—1940年《反杜林论》俄译版本的差异,吴亮平实施的历时性翻译策略调整,本质是商帮“因时而动、随市而变”经营哲学的应用。他敏锐地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历史语境来选择翻译

底本,1920年版选用了日译本,1930年选用旧俄文本,1940年选用新俄文本,以适配不同时期主流话语和革命思想传播的现实需要,并实施了历时性翻译策略调整。这种动态的文本互鉴模式突破了传统译学中源语与目标语二元对立的窠臼,展现出翻译作为跨文化阐释的复杂性特征(吴自选,2022)。这种动态化的文本互鉴模式,既尊重历史语境中的文本原始信息,又通过适应性修正确保知识在新场域中的“意义增值”,展现了翻译作为“流动的意义载体”的实践智慧。

3.2 同乡网络的社会规训与知识生产的空间表征机制

空间表征是权力主体通过知识、符号与制度建构的抽象秩序。甬籍翻译家群体依托地缘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双重纽带建构制度化的知识生产秩序,将“同乡互助”传统转化为文本生产空间表征的权力装置。

3.2.1 文化认同纽带上的群体动员:空间表征的认知整合

甬籍翻译家的意识形态聚合,本质是地域文化惯习与革命伦理诉求的深度耦合。这种精神纽带以鲁迅为核心文化标识,将“浙东硬气”的地域品格与左翼革命的现代性追求熔铸为独特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12名甬籍译者中有6名左联成员,其选择隐含着对鲁迅文化气质的认同,在知识生产场域中转化为翻译实践的精神纽带。朱镜我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王鲁彦、楼适夷、王任叔、殷夫、柔石先后由鲁迅引荐入左联。王鲁彦进入左联后,与左联中的其他甬籍成员产生了更强的合作纽带(吴旭,2022)。这种“地缘—组织”的双重关联,使分散的翻译个体转化为有共同目标的生产共同体。楼适夷听取鲁迅当时从日文和英文转译苏俄文学艺术的提倡,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虏》、柯罗连科的《叶赛宁诗抄》等多部作品。他在狱中时不畏艰难,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法国斐烈普的中篇小说《蒙派乃思的葡萄》、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集《篝火》等进步文学作品,将文学译介转化为“带镣的战斗”。王任叔、柔石等译者与鲁迅的“亦师亦友”关系,强化了“浙东文人+革命译者”的身份认同。柔石既是鲁迅文学理念的践行者,也是革命文化网络的枢纽人物(李浩,2017);他与殷夫在狱中互学德语、坚持翻译的经历,为革命保存文化火种,将同乡情谊升华为革命战友情谊(王立明,1999)。

3.2.2 组织网络中的制度性传播:近代知识文本的空间秩序建构

甬籍翻译家与文本生产场域之间通过制度性嵌

入形成了稳定的协作网络,主要体现在组织安排、文本供给机制及文本传播三方面,最终转化为文本生产的空间认知秩序。

首先,从组织体系视角观察,众多甬籍翻译家深度融入根据地宣传体系,在编辑、宣传等岗位上担任要职。朱镜我与吴亮平先后于中央及地方宣传部门履职,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革命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宣传奠定了坚实基础。吴亮平担任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会谈的翻译,凭借精湛的语言转换能力,为《西行漫记》的成书提供了关键支撑,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故事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楼适夷在抗美援朝期间出任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以笔为枪,凝聚军民斗志。崔晓立扎根根据地宣传前线,先后执掌《浙东日报》《民族日报》《前线日报》编辑之职,以报刊为阵地,将抗日救亡的思想火种播撒于浙西、上饶等地。此外,殷夫、王任叔等甬籍翻译家,将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融入文艺作品创作,其文本生产实践展现出甬籍翻译家群体的多元担当与卓越贡献。

其次,从文本供给及传播看,译者所处场域的空间表征将“革命性—实用性—群众性”建构为翻译伦理的元规范,引导译者价值取向。同时,该场域为译者文本生产提供了印刷出版等物质性资源。甬籍译者政治身份与实践经验的深度互构,推动其文本生产锚定近代中国的历史性需求,在知识转译中重构群众认知图式,完成革命话语的空间化再生产。三联书店将《西行漫记》的重译任务交给了董乐山。在翻译过程中,董乐山对原文中的意识形态表述进行了适度强化与改译,将“Manchukuo”译为“伪满洲国”。这一译法既忠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非法炮制傀儡政权的历史事实,又鲜明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强烈批判(王丽杰,2021)。董乐山将“False Foreign Devil”译为“假洋鬼子”,“landlords”译为“地主老财”。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译法,既精准传递了原文含义,又契合中国普通民众的语言习惯,有效拉近了革命叙事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此外,以吴亮平为典型代表,其翻译的《反杜林论》作为革命年代该著作的唯一全译本,获得了毛泽东“功不在禹之下”的高度赞誉。延安时期,依托根据地良好的制度性推广,成立“《反杜林论》学习小组”“新哲学研究会”。该译本被列为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重要机构的必修教材,构建了系统化、组织化的学习体系(何建华、黄自立,2018),推动该译本从零散传播走向系统化、规模化普及。

3.3 流动空间中的在地化转译与表征空间重构

甬籍翻译家的实践场域突破了传统静态空间的桎梏,其文本再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外来先进思想与本土知识体系的持续对话。这种“流动空间”不仅表现为地理空间的位移,更呈现为职业身份、话语策略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动态重构。甬籍译者作为“空间中介”,通过在地化转译策略,将个体翻译行为升华为话语体系建构的表征空间。

第一,通过话语调整策略对主流空间表征的抵抗性转译。董乐山的翻译生涯是这一互构过程的典型缩影,其策略调整直接参与了革命话语体系的术语化建构。1950—1957年间,任职于新华社的董乐山从事新闻翻译,形成精炼精准的现代语言风格(叶小宝,2021)。在翻译实践中,他敏锐捕捉“peaceful coexistence”这一核心概念的政治意涵,将其从“和平共存”修正为“和平共处”,通过新增“处”字的互动性语义,既规避冷战语境下的意识形态歧义,又为新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确立核心术语。1961—1966年转向政治理论著作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学术性文本的翻译时,他有意识地将原文的欧式语言特质转化为契合本土认知的“中国化”语言表达,如将“a stone's throw”译为“一箭之遥”(王东风,2014)。这种译法不仅实现了语言符号的精准转换,更通过文化意象的在地化重构,推动文本生产从单纯的信息传递跃升为意识形态的主动建构。1976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面对中西文化的深层碰撞,他不再拘泥于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以文化调适为核心策略。在译介西方历史文化术语时,他刻意保留“American materialism(美国式的物质至上)”“Pragmatists(务实派)”“Pragmatism(实用主义)”等概念的原生文化语境,使译文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跨文化知识”的建构载体,为新时期革命话语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对话奠定了术语基础。第二,地理空间与生命经验的双重形塑。楼适夷、崔晓立等多位翻译家辗转上海、香港、东京、湖北、北京等多元地理空间,其知识生产实践展现了文本生产从“个体经验”到“集体知识”的转化机制。在频繁的空间位移中,他们的翻译策略与意识形态建构持续迭代,文化适配与表达形式因境而变,使翻译文本突破语言转换的表层功能,成为革命话语传播、文化价值重构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复合载体。以楼适夷为例,他在东京留学期间积累的语言文化资本,为他日后译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根基;身陷囹圄时翻译高尔基的《在人间》,

他将个体苦难熔铸为文本张力,既传递原著思想,又引发读者情感共鸣(李秀卿,2012)。地理空间的变换与生命体验的叠加,使楼适夷的译文既保有对异域文化的精准诠释,又浸润着独特的个人叙事与地域文化基因,完成个人生命体验向集体精神隐喻的升维。崔晓立的实践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自苏联研习经济学归国后,凭借深厚的俄语功底与跨文化视野,他辗转上海、广西、杭州等革命前沿阵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与经济学著述熔铸为思想传播的双重武器。在翻译实践中,他以学术考据的严谨态度锚定理论内核,同时赋予译文鲜活的文字感染力,使晦涩的经典著作转化为兼具理论深度与传播效力的革命文献,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文本载体。其原创著作《战时经济学》《币价与物价》更将经济学原理与抗战时期的物资调配、货币流通等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实现了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导的有机统一。这种“因境而译、因境而作”的实践模式,本质上是译者对空间转换与时代需求的创造性回应,完成个人生命知识向集体知识的升维。

4 结语

甬籍翻译家的文本生产实践以港口文化的开放特质为精神基底,将港口文化的包容性、商帮传统的精确性与同乡网络的组织性熔铸为独特的实践逻辑。甬籍译者成为流动空间中的文化转译者与知识体系建构者,其在地化转译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不再是异域思想的生硬移植,而是转化为贴合本土经验的中国化表达。这种转译过程既保留了理论原真性,又赋予其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阐释力,为本土话语体系奠定了认知基础和重要保障。制度性的组织化运作,塑造了文本生产的空间协作机制与意义流通范式,使甬籍译者的翻译实践升华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生产,推动知识从分散的文本译介发展为系统性的文本生产工程。甬籍翻译家的贡献不仅在于文本层面的语言转换,更在于开创了“翻译即社会行动”的实践范式。他们的文本生产不仅传递了革命理想,更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世界(张羽,2000;黄自立,2019)。面对“文明互鉴”的时代命题,在“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下,甬籍翻译家的文本生产经验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多重启示意义。当代译者在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故事时,应避免机械的概念输出,依托扎根本土经验

的在地化转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突破语言屏障,真正转化为可感知、可认同的世界话语,推动中国从“文化输入地”向“文明对话主体”的角色转型。



参 考 文 献

- [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2] 陈洁. 草婴先生的翻译人生和翻译艺术 [J]. 上海翻译, 2020(5).
- [3] 方华文. 20世纪中国翻译史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 [4] 方梦之. 翻译家研究的“宽度”和“厚度” [J]. 英语研究, 2021(1).
- [5] 冯骥才. 草婴先生瘦小的重 [N]. 光明日报, 2011.
- [6] 何建华, 黄自立. 《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8(6).
- [7] 黄自立. 《反杜林论》的汉译传播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哲学治思 [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9.
- [8] 李浩. 鲁迅序“左联”作家著作两则 [J]. 上海鲁迅研究, 2017(4).
- [9] 李秀卿. 当革命邂逅闲适——论楼适夷与志贺直哉 [J]. 上海鲁迅研究, 2012(3).
- [10] 梁林歆, 李浩然. 近现代鄂籍翻译家群像研究 [J]. 外国语文研究, 2023(6).
- [11] 列斐伏尔(著). 刘环玉(译). 空间的生产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12] 罗倩妮. 《西行漫记》译者董乐山的翻译追求 [J]. 兰台世界, 2015(4).
- [13] 牛荣亮, 许明. 翻译地理学视角下的区域翻译家群体研究——以近代珠海籍翻译家群体为例 [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3(1).
- [14] 王东风. 翻译与身份——兼评董乐山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 [J]. 中国翻译, 2014(5).
- [15] 王建开. 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意义与方法 [J]. 上海翻译, 2007(2).
- [16] 王立明. 左联五烈士与外国文学 [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6).
- [17] 王丽杰. 学者型译者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研究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7).
- [18] 吴旭. 《译文》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建构研究 [D]. 贵阳: 贵州师范大学, 2022.
- [19] 吴自选. 翻译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语境主义诠释——以《反杜林论》吴亮平译本为中心 [J]. 上海翻译, 2022(3).
- [20] 徐艳红. 从李俍民的汉译本《牛虻》看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 [J]. 琼州学院学报, 2011(6).
- [21] 叶苗. “港口文化”应成为宁波软实力核心 [N]. 钱江晚报, 2010.
- [22] 叶小宝. 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当代传奇翻译大师董乐山 [J]. 安康学院学报, 2021(4).
- [23] 岳峰, 朱汉雄. 红色翻译史的研究架构 [J]. 外国语言文学, 2021(3).
- [24] 张杰. 著名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叶水夫先生 [J]. 外语研究, 2000(1).
- [25] 张一兵. 社会空间实践与空间表象和表征——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 [26] 张羽. 叶水夫——俄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外国文学工作的组织者 [J]. 俄罗斯文艺, 2000(3).
- [27] 仲文明, 王靖涵. 中国科技翻译家群体研究(1949—1990)——基于两部辞典的管窥 [J]. 上海翻译, 2023(4).
- [28] 周军.“国民喉舌”和“民众先导”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7.
- [29] 周领顺等. 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思路——主体以江苏籍翻译家群体翻译行为研究为例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4).
- [30] 朱安博. 归化与异化: 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流变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基金项目: 本文为浙江省“十四五”第二批本科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基于知识图谱的英语翻译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 JGBA2024692)、浙江省外文学会专题研究项目“翻译地理学视域下的革命文本生产——以甬籍译家群为中心”(项目编号: ZWYB2025024)、2025年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校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行动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5YGH026)、浙大宁波理工学院2023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知识图谱驱动下的翻译课程体系构建探究”(项目编号: NBTJG-20230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25-02

通讯地址: 315100 浙江省宁波市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Textual Practices of Ningbo Transl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LIN Jingjing & MAO Haona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ingboTech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China)

Abstract: Using Henri Lefebvre'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extual practices of modern Ningbo translators within multidimensional fields such as port spaces and native-place networks. It reveals the co-constructive mechanisms betwee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knowledge translation. Key findings include: First, Ningbo's geographical openness as a modern treaty port and the social connectivity of native-place networks jointly established a translation ecosystem, shaping the translational habitus of Ningbo translators. Second, leveraging dual bonds of geographic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belonging, the Ningbo translator community developed a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mechanism with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rd, "localized translation", as

the core mechanism of spatial practice facilitated the indigenization of foreign intellectual resources, enabling deep coupling between modern knowledge systems and local societal needs. The findings corroborate the pivotal role of Zhejiang's translation community, represented by translators from Ningbo, as a bridgehead and pione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Ningbo-based translators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Zhejiang as a regional hub of translation, facilitating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while offering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e localization of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Key words: Ningbo Translators;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Localized Translation